

# 十七八岁

■刘京生



陈磊绘

正好卡在两根铁轨的接头处。有惊无险，大家都说我有福气。但我并不是每次都能这么走运。还有一次，我们需要竖起一块大铁板。操作过程中，我的脚被卡住，铁板重重地砸在我的脚趾上。

脱下鞋来看，我的两个脚趾甲被砸得翻了起来。战友将我送到卫生所后，卫生员不得不把那两个脚趾甲连根拔除。战友张小弟将他每月仅有的7元津贴全都给我买了营养品。在大家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我的脚伤得以痊愈。

海岛上的岩石风化严重，坑道的口部有几十米高。由于上方经常落石，进出坑道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营里决定从陡峭的山顶用绳索吊人下去悬空打钻，再利用多根长钻杆将坑道口上方的石层与山体固定。这项工作极其危险，需由体重轻、技术好的风镐手去完成。我主动请战，坚决要求上阵。那天，当我来到山顶系好绳索的时候，连长张汉生和副排长施健儿对我说：“小刘你看，绳子的那头系着你，这一头系着我们俩，如果坑道口塌方你‘光荣’了，我们

也会跟着你一起下去！”那一刻，一股暖流涌遍我全身，我更加懂得战友的情谊与共产党员的责任。

在海岛上，我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。1971年6月，我刚满18岁就光荣入了党。

我还想起母亲对我讲过的她的十七八岁。我母亲是吉林省磐石县（今磐石市）人，生于1921年3月，原名崔素贞，后来因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崔恒，后改名松伟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母亲念书的学校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。在学校教书的姥爷带着全家加入东北义勇军。1932年春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，母亲一家从东北来到北京，建立了东北义勇军的北京地下联络点。第二年，12岁的母亲正式加入东北义勇军青年抗日先锋队，成了一名交通员。

除了放哨和传送情报外，母亲曾化妆成阔小姐，冒着生命危险把义勇军的军饷缝在旗袍里，送出山海关，交给地下党联络站。七七事变后，母亲在北安

故事，也对她描绘过大海的辽阔，但是她却很少见我穿军装的样子。那个让她逢人就说“爸爸是军人”的男人，穿军装的模样，她更多的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了。

知道女儿学会不少军歌后，与她视频通话时，我便常常千里“点歌”。有时遇到没学过的歌，她也不慌乱，隔着屏幕和我拉钩，约定好时间，等下次视频通话时她便如期“交作业”。女儿从来都是说到做到，小小的承诺比铁锚还沉。我欠她的“按时休假”却一拖再拖。

上个月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千里“点歌”，女儿却提出“学会了这首歌，爸爸就要回来陪我”的条件，我随口答应下来。学会后，女儿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向我“炫耀”。可随着曲调收尾，我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解释。

“爸爸是军人，要服从命令……”因为单位安排我随船出海执行任务，我没

河看到了战争过后尸横遍野的惨状，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。在平西，她进入杨成武领导的八路军独立第一师。因为年龄小，组织上安排她先做儿童团和妇女工作。

她经常只身一人奔走在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中，一家家、一村村地发动广大妇女做军鞋、军装、军被，为八路军筹措粮食、药品和救治伤员。越来越多的妇女组织起来后，她先后担任山西、平西几个县的妇救会主任。

有一次，母亲沿拒马河去平西区党委开会，走了很久的路没有东西吃，就在河边舀了些蝌蚪喝进肚里充饥解渴，有了力气才过了河。当时对敌斗争形势极其残酷，日伪政权贴出告示重金悬赏抗日县干部的人头，县长是2万元，母亲是1.9万元。母亲告诉我，有一位区妇救会干部叫王英，因为临产没来得及撤退，被日本鬼子抓住后用刺刀剖开肚子挑出胎儿挂上树梢。军区锄奸部的女干部张立，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转移途中被日本鬼子抓住。她的孩子被敌人扔进开水锅里活活烫死，张立也被残忍杀害。母亲还说，八路军对敌伪的斗争也针锋相对，在公审汉奸的大会上，她和其他同志一起，亲手处决了6名大汉奸。

经过残酷斗争的千锤百炼，母亲对敌人刻骨铭仇恨，对人民无比热爱。1938年，党组织派她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在延安，她加入了共产党。那年，母亲尚不满18岁。

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。如今，我已年过古稀，母亲也已去世多年，但我脑海中的青春记忆却愈发清晰、挥之不去。我真羡慕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，他们那一张张洒满阳光的笑脸，就是描绘祖国和平安宁的最美丽的图画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。虽说历史环境各有不同，但中华儿女的血脉和心意是相通的。我相信当年那些十七八岁的中学生，现在一定在建设或者保卫祖国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，那些稚嫩的幼苗一定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法请假回家，对女儿的承诺也落了空。妻子立即当起“中间人”，柔声向女儿解释，希望她能理解。小小的她似懂非懂，眼睛哭得通红，妻子哄了好长时间才哄好。后来一次视频通话，女儿说：“你们告诉我要说到做到，为什么爸爸做不到？”我只得满脸歉意地向女儿保证，以后一定履行约定。

都说女儿是爸爸的棉袄，这话真不假。女儿一直很乖巧讨喜，每次我回家，她都围着我转，唱歌给我听，仿佛要把攒了许久的歌单全部唱完。那些歌声里，有思念、有期盼，也有她小小的骄傲。

军港的夜又静了，望着远方星星点点的渔火，耳边仿佛又响起女儿的歌声。有些承诺虽然会迟到，但爱不会迷航。我知道，电话那头的小人儿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思念谱写成动人的歌，让我身处的这片海洋，一如家般温暖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终日劳作，很少见他闲下来。耕田、打柴、种菜，一年到头，他总有干不完的活。他的脚上满是厚厚的老茧，即便用剪刀修剪，也会很快再长出来。

小时候我看着父亲剪脚上的老茧，总觉得父亲能干，好像他生来就不知道疼，也不会累。如今自己活到了这个年纪，才知道那一层层老茧，不只是走路磨出来的，更是苦日子、累日子一天天压出来的。

父亲一生忠厚善良。母亲常说他：“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着头。”其实，父亲并不是怕事。他只是本分善良，不愿与人争，也不肯把难处推给别人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家里刚分到田的那一年，稻子正抽穗，却偏偏赶上天旱。田里缺水，父亲忙活了一晚上，好不容易才把自家的田灌满。谁知第二天一早到田里一看，满田的水都没有了。原来，是邻居把水放到了他家的田里。母亲知道后气不过，要去找邻居争个明白。父亲却把她拦了下来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一个人去把田重新灌满。那时我不明白，明明受了委屈，父亲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。后来我才懂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亏，只是不愿为这点事和乡里乡亲伤了和气。

定格 日前，新疆军区某团干部阿尔申的家属随军落户。图为阿尔申周末与孩子在营区共度亲子时光。

加苏尔·艾来提摄

## 念 亲 恩

营区洗衣房的白炽灯嗡嗡作响，我坐在马扎上，笨拙地缝一颗脱落的纽扣。针尖几次扎偏，在军绿色的布面上留下细小的痕迹。我忽然想起母亲穿针的样子。她把针举到灯下，对着光，食指和拇指捏着线头轻轻一振，线便听话地钻过了针眼。

这个动作，她重复了一辈子。老家的床头有个铁皮饼干盒，里面装满了母亲的“家当”：各种颜色的线轴，一枚磨得发亮的顶针，还有半截铅笔头。小时候，我的裤子膝盖处总被磨破，母亲便会翻找出颜色相近的布头贴上去，针脚一圈一圈地走。最后磨破的地方，会开出一朵朴素的花。

高考前一个月，我的校服袖口脱了线。她接过去，捏了捏布料，打开针线盒。那天她穿了两遍才把线穿过去——这是第一次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开始花了。她低着头，针在布料间起起落落，拉线的力道一如既往地均匀。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斜照进来，照着她鬓角的白发，一根一根，像被针挑出来的银丝。我别过脸去，假装看桌上的模拟题。

高考完的那个夏天，蝉声还没有落下去，我报名参军。随后，我顺利通过体检、政审等关口，9月初定下入伍日期。出发那天，凌晨4点母亲就起来了。厨房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响，还有她压低的咳嗽声。我推开门，看见她正往我的背包里塞东西：煮好的鸡蛋用报纸裹着，怕凉，又多缠了两层塑料袋。灶台上的粥冒着热气，她盛出一碗来，用筷子一圈一圈搅动，让热气散得快一些。

上大巴的时候，她站在送行的人群里，没有往前挤。我回头找她，她朝我扬了扬手，嘴唇动了动，听不清说了什么。车开出很远，我透过蒙着薄雾的玻璃窗回望，她依旧立在原地，身影越发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灰蓝色的点，钉在清晨的雾气之中。

新兵连那会儿，每晚点名前有1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。很多战友会趁这时打电话回家，大多简单报个平安，三两句便挂断。我却不敢打电话，生怕一听见她的声音，积攒的情绪就再也绷不住。直到第一次拉练，我的脚上磨出一排血泡，卫生员拿针帮我挑破血泡时，我骤然想起了她。

那晚我靠在走廊墙壁上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铃声刚一响起，母亲便接了，仿佛一直守在电话旁。“吃得惯吗？”“训练能跟上不？”“冷了自己加衣裳，别硬撑”……她顿了顿，听筒里传来针线盒盖上盖子的轻响，大概她方才正在缝东西。后来妹妹对我说，那晚挂断电话后，母亲坐在床边出神许久。

去年探亲回家，我穿着军装推开门，母亲正在阳台上缝补一件旧衣裳。看见我，她手猛地一抖，针扎进了食指。她没有出声，将指尖放进嘴里轻轻抿了抿。起身时，衣裳自膝盖滑落，阳光静静铺了一地。我上前去捡，才看见衣襟上

写 给 父 亲

■谢祥涛

## 岁 月 有 情

昨晚，我又梦见了父亲，还有老家的房子。醒来以后，我才慢慢想起，父亲已经离开我41年了。

41年过去，如今我也60多岁了。我现在的年纪，已经超过了父亲离世时的年纪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总是不尽滋味：父亲辛劳了一辈子，还没来得及歇一歇，就走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终日劳作，很少见他闲下来。耕田、打柴、种菜，一年到头，他总有干不完的活。他的脚上满是厚厚的老茧，即便用剪刀修剪，也会很快再长出来。小时候我看着他父亲剪脚上的老茧，总觉得父亲能干，好像他生来就不知道疼，也不会累。如今自己活到了这个年纪，才知道那一层层老茧，不只是走路磨出来的，更是苦日子、累日子一天天压出来的。

父亲一生忠厚善良。母亲常说他：“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着头。”其实，父亲并不是怕事。他只是本分善良，不愿与人争，也不肯把难处推给别人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家里刚分到田的那一年，稻子正抽穗，却偏偏赶上天旱。田里缺水，父亲忙活了一晚上，好不容易才把自家的田灌满。谁知第二天一早到田里一看，满田的水都没有了。原来，是邻居把水放到了他家的田里。母亲知道后气不过，要去找邻居争个明白。父亲却把她拦了下来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一个人去把田重新灌满。那时我不明白，明明受了委屈，父亲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。后来我才懂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亏，只是不愿为这点事和乡里乡亲伤了和气。

昨夜梦醒后，我还惦记着老家的房子。人老了，明明知道父亲早已不在了，心里还是想赶紧回去看看。只是我再也回不到父亲身边了。

# 母亲手中那根线

■周鹏

的针脚，较之记忆里稀疏不少，有几处歪歪扭扭。她的手，开始抖了。

她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：“壮了，黑了。”说完，转身走进厨房，炒菜的声音很快响起。那天午饭，桌上摆着6个菜，我碗里米饭底下，埋着两个荷包蛋。她坐在对面，吃得很少，只是静静望着我，目光如一缕线，细细密密拂过我的每一寸变化。

前些日子，妹妹发来一张照片。母亲坐在阳台矮凳上，借着一窗秋阳穿针。她眯着眼，手高高举着。妹妹说，她想帮母亲穿，母亲不让，说自己还没老到连针都穿不上。妹妹只好站在一旁，见母亲尝试好几回都没能穿上线，心里发酸，便偷偷拍下这张照片。后来母亲轻叹一声，放下针线，转身去择菜。

我缝好了那颗纽扣，小心剪断线头。针脚不及母亲那般细密，倒也还算利落。我忽然想到，这不甚齐整的针脚，正是母亲这一生留在我身上的印记——算不上完美，却带着她千里之外的爱，带着她灯下没说完的话。

夜里站岗，我的头顶铺展着高原辽阔的星河，脚下的土地安静地睡着。长风吹来，军装紧贴身体。我轻轻抚摸缝补处，仿佛母亲隔着山河，把线头轻轻一扯。母亲穿了一辈子的线，那些针脚里，藏着她的老去，藏着我的成长。她将整个家的温暖，密密缝在我生命中。她的牵挂，如一根扯不断的线，从老家的灯下，一直延伸到这片高原上。

他知道，日子落到头上，躲也躲不开。重活累活，总得有人去做。有些话别人干不来，也不愿意干，只有父亲能干。生活把担子放到他的肩上，他便扛着，从来没有想过放下来。

一次生产队队长把四五块很小的水田交给父亲，让他犁好。这活并不好干，田地小，分布零散，人在里面不好转身，牛更难转回来。这样的活，别人都觉得难办，父亲却二话没说，牵着牛就下了田。不到一个上午，几块小田就全被他犁好了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父亲送我去当兵。送子参军，是为了圆他心中的军梦。他只想看儿子能够走进军营，能干一番事业，却没有为自己多作打算，也没有想过儿子走后，他由谁照顾，病了谁送他去医院。

我入伍后不久，父亲便离开了人世。那时我还年轻，总以为往后的日子还长，等我回来，还有机会陪伴他、孝敬他。谁能想到，入伍时的那次离家，竟成了我与父亲的永别。

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真正懂他。等我自己也老了，走过了比他更长的人生，才一点一点读懂他的沉默，读懂他脚上的老茧，也读懂了他把儿子送去当兵时，心里舍下的是什么。

可是，我懂得太晚了。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话，也没有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。他留给我的，是一个庄稼人一辈子的忠厚和担当。41年来，每当生活中遇到难处，我总会想起父亲。父亲就像一盏油灯，光芒并不耀眼，却一直没有熄灭，照着我走到了今天。

昨夜梦醒后，我还惦记着老家的房子。人老了，明明知道父亲早已不在了，心里还是想赶紧回去看看。只是我再也回不到父亲身边了。

## 军娃天地

“军港的夜啊，静悄悄……”视频通话的另一端，5岁的女儿把脸蛋凑近屏幕，小嘴一张一合轻声哼唱。一曲罢了，她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爸爸，我唱得好不好？”我故意拖长声调，笑着反问女儿：“难道我的掌声不够热烈？”她咯咯地笑起来，像撒欢的小麻雀。

挂断电话，我心里泛起了酸。海风拂面，海浪轻涌，女儿的声音像一股细长又坚韧的线，跨越千山万水，紧紧牵着我的心。

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唱歌，尤其是对军歌情有独钟，让我颇感意外。我和妻子曾回想种种缘由，或许是胎教中埋下的种子。怀孕初期，妻子来队探亲，每天晨起有军号，日落有军歌。或许是我的“私心”，每次照看孩子，我总给她唱些铿锵有力的歌曲。又或许是女儿天性使然，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，自己发出清越的鸣响。总之，女儿爱上了唱歌。有一回，妻子告诉我，楼下邻居对她说：“孩子爱唱歌就好好培养。”听到这话，妻子满心自豪。

平日里只要一得空，女儿就像小哨兵一样，蹲守在智能音响设备前学唱军

